

中國歷史文獻研究 (一)

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
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獻研究所編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

张舜徽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武昌：桂子山）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武大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8.75 字数450,000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

书号11406·03 定价：精 6.10元
简精 5.20元
平 4.30元

斐雲先生有道前被宋本君經
音辯首末二冊近在故宮及現宋本
州本左傳自卷三以下亦在南遷中
遲舊藏音辯中冊左傳卷一卷二兩
冊亦可補成完書此二本皆宋本上駟
出為劍合珠還計不應再自秘惜

周叔弢先生致趙万里（斐雲）手札真迹第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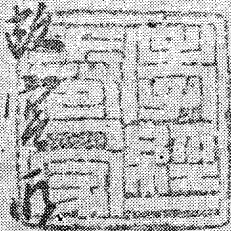
今特檢出奉上乞代獻之故宮博
物院書之幸亦遲之幸也此等書
非尋常交易豈可言錢更不能
計多寡區區下忱乞代達馬先生

弟叩 勿此致誌

道安

弟期 遲友

再音宋本音辯遲巨手校中冊
便中布乞書 兄代核印



藏二冊

周叔破先生致趙万里（斐云）手札真迹第二页

目 录

子史标题辨惑·····	张舜徽 (1)
三坟五典·····	顾颉刚遗著 (6)
骏翁遗札·····	周叔弢遗著 周一良整理 (9)
经今古文学之争,系学术问题抑政治问题·····	蒋逸雪遗著 (40)
古书引经传经说称为本经考·····	王利器 (43)
关于《牧誓》的成书年代问题·····	吕锡生 (48)
论《黄帝四经》的思想史文献价值·····	赵吉惠 (55)
《王制》制度为《大戴礼记·千乘》所本考·····	金德建 (64)
《春秋繁露》简论·····	杜宝元 (68)
刘孝标及其《世说注》·····	萧 艾 (76)
司马迁卒年考·····	施 丁 (91)
司马迁写汉武帝征伐匈奴·····	张大可 (103)
司马迁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何旭光 (114)
沈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辨误·····	李廷先 (122)
《报任安书》注商·····	吕友仁 (130)
重读《孔子世家》,重评孔子功过·····	邹身城 (135)
《史记·吴越世家》札记·····	奚柳芳 (147)
裴松之《三国志注》引书考·····	周国林 (152)
《史通》与《论衡》比较研究·····	符定波 (159)

《史通》编撰问题辩正·····	乔治忠 (166)
论马令《南唐书》·····	朱仲玉 (177)
试论《资治通鉴目录》·····	王义耀 (183)
《通鉴考异》校读札记·····	孙文泱 (188)
劬堂随笔——读《通鉴》·····	柳诒徵遗著 柳曾符整理 (196)
《续资治通鉴长编》校勘释例·····	吴绍烈 (202)
《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见宋人语词试论·····	林艾园 (208)
《宋史·宰辅表》订误·····	顾吉辰 (220)
宋人笔记的史料价值·····	王瑞明 (232)
《事物纪原》源流浅探·····	许沛藻 (244)
罗愿《新安志》探论·····	林衍经 (250)
《百战奇法》书考及其思想初探·····	张文才 (256)
试论乾嘉学派产生的背景及其历史功过·····	陶家康 (266)
读古今人表杂志·····	王利器 王贞珉 (275)
《四库提要》介绍《锦里耆旧传》一文辩误·····	孙永如 (279)
略谈《筹海图编》的版本·····	范中义 (281)
清人笔记随录(三则)·····	来新夏 (285)
赵州桥桥名考·····	林树涵 (293)
“三门”应为“仙居”·····	徐永恩 (295)
编者说明·····	(295)

子史标题辨惑

张舜徽

上

我在一九八一年写过一篇《经传标题辨惑》（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谈到了整理古代文献，首先要弄清楚古籍标题的问题，举了经传中的实例说明辨清标题的重要。其实，几部儒家经传，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是极少量。占古代文献中数量最大的要算是子、史两部类的书了。这两大部类的书，如果弄不清楚标题的原意，便容易产生许多疑问，更无从肯定其中内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替深入研究带来不少障碍。所以每部书的标题问题是首先要明确的问题，值得我们重视。

认真追溯到远古时代的著述文字，除抒情的诗歌以外，不外纪实、说理两大类写作。由纪实方面发展起来，便成为史部的书；由说理方面发展起来，便成为子部的书。这两大类的书最多，几乎可以概括一切著述文字。清末学者朱一新在《无邪堂答问》中说过：

古来文字，只有二体：叙事纪言者为史体，自写性真者为子体。圣人之言，足为世法，尊之为经，经固兼子史二体也。文事日兴，变态百出，歧而为集，集亦子史之绪余也。

朱氏认为著述之初，不外子史二体，这是对的。但以那“自写性真”的书为子，却不很恰当。我们仔细分别古代文献，有一种是“立言”的书，有一种是“记事”的书。立言的书是子，记事的书是史。立言的书，主于发表见解；记事的书，主于纪录史实。如果进一步推原竟本，那末所谓立言之书，也不过是学说思想史的内容，都可归之于史。所以明代学者王世贞在《弇州四部稿·艺苑卮言》中指出：

天地间无非史而已。六经，史之言理者也；编年、本纪、志、表、书、世家、列传，史之正文也；叙、记、碑、碣、铭、述，史之变文也；训、诰、命、册、诏、令、教、劄、上书、封事、疏、表、启、笺、弹事、奏记、檄、露布、移、驳、谕、尺牍、史之用也；论、辨、说、解、难、议，史之实也；颂、赞、铭、箴、哀祭，史之华也。

李贽在《焚书·经史相为表里》中也说：

《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可也。

李氏此言，足以补充王说，而在李氏以前，王守仁在《传习录》中，也谈过“五经皆史”。

可知“六经皆史”之说，不是从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才开始提出，明代学者早已谈到了。清代学者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中肯定的说：“史之外，无有文字焉”。这也不是过激的论断了。

文献学即是“广义的史学”，它的内容自然包括一切有文字记载的史料在内。范围既如此庞大，任务就特别繁重。我们有必要首先辨明哪些资料是原始的，哪些资料是附加的，才能进一步辨明真伪，区分高下，有步骤地去整理它。而对书的标题，首先要有明确的理解，才能掌握其中的内容实质，这是必然的。我们现在还是从标题谈起吧。

秦代以前诸子百家之书很多，标题多为“某子”，例如《老子》、《管子》、《墨子》、《庄子》、《孟子》、《商君书》、《孙子》、《吴子》、《韩非子》之属，著录于《汉书·艺文志》的，真是百家竞起，名目繁多。后世学者们粗略地认为都是那些人自己的写作，加以尊重。只是怀疑到有些书的内容为什么涉及了作者身后的事？为什么出现了后来的人名、地名和历史事实？于是辨伪之说纷纷起来，彼此诘难，争个不休。其实这种诘难和争论，是不必有的。如果能弄清楚古代著述体例，便可彻底了解其所以然。

古代的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军事家，有的汲汲皇皇，奔走游说于外；有的忙忙碌碌，理政治军于内；何尝有空余时间亲自伏案著书。况且远古传播思想记载议论的工具和条件，都很粗糙和艰难，不像后世的方便，不可能人人各自著书。宋代学者朱熹，便曾说过：

管子以功业著者，恐未必曾著书。其书恐只是战国时人收拾仲当时行事言语之类著之，并附以他书。

这一言论记载在《朱子语类》，是比较通达的见解。有了这种看法，自然对于《管子》书中载有管仲身后的事，不必怀疑了。清代学者严可均在《铁桥漫稿·书管子后》中也曾指出：

先秦诸子，皆门弟子或宾客或子孙撰定不必手著。

凡是具备了这样见识的人，一部先秦古书到手，便易于判断其成书时代；而不致遇见《管子》，便认为出管仲之手；遇见《孙子》，便认为是孙武所作了。况且“子”的名号是男子之尊称，在古代普遍施用。《论语》中称孔子为“子”，是孔门弟子对孔子的尊称，那时绝没有自称为“子”的。（后世文人学士撰文著书，有自称为“子”的，则流于荒谬袭古，是另一回事）。先秦诸子百家之书，多由门弟子或宾客或子孙所撰集，而标题为“某子”，这是很自然的事。

在秦以前，由于为写书的工具和条件所限，不得不将内容相同或相近的资料写在一起以求省事，也就成为保存古代文献的一个通例。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古代帛书共约十二万字。其中《老子》便有两种写本：一种写本的字体，介于篆隶之间，根据书中不避汉高祖刘邦讳，抄写时代至晚在高祖时期；另一种写本的字体是隶书，根据书中避汉高祖刘邦讳，不避惠帝刘盈讳，抄写时代略晚，当在惠帝和吕后称制时期；距离今天，都有二千一百四十多年了。人们称前者为甲本，后者为乙本。甲本卷后有古佚书四篇，无篇题；乙本卷前有《经法》、《十大经》、《称》和《道原》四篇。可知古人写书，多取内容相同或相近的篇章钞在一起，这是常有的事。推之《管子》诸书，也莫不如此。

经过汉人整理，特别是刘向校书秘阁，删繁除复，厘定篇章，成为今本。即以《管子》为例，刘向所依据的原材料，有“中箠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

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可知《管子》一书是由多种资料组合而成的，无异于是一部大杂会的丛书，何尝不是专限于和管子其人有关的资料呢？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周秦诸子的标题，便应该有所识别，不可笼统来谈。

下

远古的人写文章或著书立说，不和后世文人学士一样，先将题目标明，然后着手写作，写完再标明自己的姓名，这是后世著述界的现象，不能拿来衡量古人。远古的人从事写作，不是为了追求名利，而是要把那些值得保存的史实和议论，用文字记录下来以公诸于世便够了。所以不独不标明作者姓名，连篇题也没有。保存到今天的《诗三百篇》，每篇都是摘取篇首二字或数字以为篇名；下逮《论语》二十篇，《孟子》七篇，都是沿用此例。这种标题，不是作者所原有，而是由后来编定篇章的人加上去的。

其次，有些书在写作时虽有篇名，但在写完之后，却没有全书的名号，这也是常事。这种事例，到西汉初年还普遍存在。当汉高帝初定天下，吩咐陆贾替他写一部历史故事的书。《史记·陆贾列传》有一段记载：

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由此可见，当时陆贾写成的十二篇，原来并没有书名。汉高帝看了以后，特别高兴，认为那里面内容，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新鲜话。这“新语”二字的标题，明明是高帝加上去的。

又如司马迁所写的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的大著作完稿以后，在他的《自序》和《报任安书》中，都没有说明这部著作的书名是什么。根据《史记·孝武本纪索隐》引西汉学者桓谭《新论》中谈到此事，说过：

太史公造书成，示东方朔，朔为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东方朔所加也。

据此，可知司马迁的著作写成以后，原来是没有书名的。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史公原著但有小题（每篇篇名），而无大题（全书总名），论断比较精确。由于东方朔最先看到这部著作时，替它题上了“太史公”三字，于是这三字便成了这部著作的书名。《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便著录《太史公》百三十篇，可知这标题在汉代是普遍采用的。汉代学者，谈到这部书，或又称《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而没有人称它为《史记》。加以司马迁在自己写作中称“史记”的有七八处：或曰“读史记”（《周本纪》、《陈杞世家》），或曰“论史记旧闻”（《十二诸侯年表》），或曰“史记独藏周室”（《六国表》），或曰“余观史记考行事”（《天官书》），或曰“因史记作春秋”（《儒林传》），或曰“史记放绝”（《太史公自序》），都是泛指旧史或列国史记而言，他自己所写的书，不以“史记”二字标题，是很清楚的。两汉学者既多称此书为《太史公记》，“史记”二字，自可理解为“太史公记”的简称，相承沿用，便以此为百三十篇的总标题，却已很晚了。

有人会问：到了汉代，著述界还是这样简朴，连书名都没有，何足以体现一代文化的兴

盛?我们的回答是:上面所举陆贾、司马迁的事例,只是说明在西汉初期的著述界,还保存了一书写成以后没有大题的古朴风气;而不是说明到了汉代一般著述全都没有书名。恰巧相反,在这以前,早已出现了结构精密、题号明显的完整作品。

当春秋战国之际,百家争鸣,发表见解的书籍日出日多的时候,社会上需要一种总结帐式的荟萃群言的书籍。于是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便适应客观需要,大规模地组织人力,来从事这一浩大繁难的工作。《史记·吕不韦列传》写道:

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现在仔细检查这部书的内容,确也丰富。诸子百家的思想,无所不有。从结构方面来说,大的门类,不外纪、览、论三者。但又各统子目:纪有子目六十一,览有子目六十三,论有子目三十六,实共一百六十篇。举凡道德、阴阳、儒、法、名、墨、兵、农诸家学说的精华,都可考见其大凡,成为有系统有组织的大部书。我国著述界,开始出现形式整齐,条理缜密,篇题、书名,都由前定,按预订计划写成的作品,这自然是第一部。

有了这一新的写作形式以后,著述界自然起了很大的变化。最主要的,体现在组织材料方面,由没有系统,进入有系统。司马迁能够总括来自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的材料,用本纪、年表、八书、世家、列传的体例,组织成为一百三十篇的巨著,无疑是受了它的影响的。自此以后,学者文人们的写作,大抵先将全书标题、每篇标题拟好后,才开始按计划动手草创。这虽然是一种进步的上升的现象,但却不可拿这种后起的写作形式,去衡量远古的书。

司马迁的书,贯通古今,总结了汉武帝以前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后人无以为继,只得沿用这一纪传体,改为断代编写。从《汉书》以下,历代都有专史。即以《汉书》而论,后人只看到它的标题,便认为不应该涉及汉代以前的史实。而忽略了《汉书》的某些部分是对司马迁的书拾遗补缺加以充实的。例如《汉书·十志》,便是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加以发展而成。班氏并《礼书》、《乐书》为《礼乐志》;《律书》、《历书》为《律历志》;改《天官书》为《天文志》,《封禅书》为《郊祀志》,《河渠书》为《沟洫志》,《平准书》为《食货志》;这都是名异实同,不过增其未备而已。新添的有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莫不贯通古今,也不专叙汉事。这是由于有关文物制度的写作,自必明其源流,穷其变化,才能考见事物发生发展的情况。所以历代“正史”的《志》,绝不可为书的标题所限,而缩小了它的作用。

明了这一通例以后,对于后来有些缺《志》的断代史,便可利用其他有关朝代的《志》去作补充。例如《三国志》没有《志》,我们可用《宋书》的三十卷《志》去弥补。此三十卷书,论列一事,每每远溯三代,近及秦汉,而尤详于魏晋。所以读《三国志》时,便可参览《宋书·八志》以考制度沿革。又如《南北史》也没有《志》,我们可用《隋书·十志》去补充。《隋书·十志》,统括了南北朝时典章文物之全,实为梁、陈、齐、周、隋五代作,所以原来又称《五代史志》。《隋志》可补《南北史》之缺,犹之《宋书》诸《志》,可以补《三国志》之缺。我们不可因为书的标题为断代史而忽略了它。

司马迁所著一百三十篇,而《列传》占了七十。除将重要人物各立“专传”以外,还将

行事相近的人汇叙在一起，为列“总传”。例如当时认为好的官吏，便汇叙为《循吏传》；有名的学者，便汇叙为《儒林传》。此例一开，于是历代“正史”，沿用其体。我们如果想找二千年间学术源流派别，历代史中的《儒林传》，便是重要资源。从《后汉书》创立《文苑传》后，历代“正史”也多效其体。我们如果考镜文学盛衰得失，便必参考历代《文苑传》。但是检查一下其中的内容，凡是列在《儒林传》或《文苑传》中的人物，差不多都是当时学术界、文艺界二三流的脚色；至于头等第一流的大学者或大文豪，他们都立有专传，不在总传中；这是历代史中列传的一个通例。像西汉时的贾谊、董仲舒、司马迁、扬雄，东汉时的班彪、王充、贾逵、郑玄，都不在《儒林传》而自有专传；东汉时的张衡、蔡邕，也不在《文苑传》而自有专传；这种例子，不能尽举，历代史中，全是如此。所以我们切不可局限于“儒林”、“文苑”的标题，而忽略了其中重要人物，是值得注意的事。

三 坟 五 典

顾颉刚 遗著

左史倚相……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左传》昭公十二年)

杜预注：“皆古书名。”盖以其书久亡，故不强为之说，明其慎也。而王肃伪造《古文尚书》，并为孔安国作伪序，乃云：“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于是羲、农、黄帝为三皇，其书曰《三坟》，昊、顼、辛、唐、虞为五帝，其书曰《五典》，欺人者阅千七百年而未已。顾何以言大道之《三坟》竟一字不存，而言常道之《五典》亦仅存尧、舜合传之《帝典》（《尧典》）一篇，此则虽善于附会之儒生所不能为之曲解者已。

按“三皇、五帝”之说在《左传》著作时代实犹未完全形成。五帝之说始于春秋之季而完成于战国中叶，所谓黄帝、炎帝、太皞、少皞、颛顼诸名，《左传》、《国语》诸书已多道之；若伏牺、神农，则《孟》、《荀》诸子亦继言之。至于“皇”字，在战国以前只是形容词及副词，偶亦用作动词，如《书·吕刑》之“皇帝哀矜庶戮之不幸”及《诗·豳风》之“周公东征，四国是皇”，《鹖冠》之“皇皇后帝，皇祖后稷”皆是；亦或用为姓名，如皇颉、苗贲皇之类是，而绝无作为一种阶位之名称者。至战国初期，本用以尊称上帝之“帝”字已降为人王之位号，如孟子所云“舜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于是上帝不能不别立一尊称，因改用训“美”训“大”而又惯用作天神之形容词之“皇”字升格以称上帝，如《楚辞·离骚》之“西皇”及《九歌》之“东皇太一”是也。及至战国后期，则此“皇”字亦复转化而为人王之称号，于是五帝之前始有“三皇”之说。当秦王政之统一中国也，“三皇、五帝”之名号已合称于诸子之书，为显耀其功德之隆重，乃各摘其一字而自定其位号曰“皇帝”，自此以后，凡窃帝号以自娱者，不论其为统一或偏安，无不曰“皇帝”、“皇帝”云。

然秦始皇帝时之“三皇”非王肃所谓牺、农、黄帝也，故当群臣拟位号之际，其言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按《史记·封禅书》记齐八神，首曰“天主、地主”，“天皇”、“地皇”二名疑即由此而来。“泰”、“太”字通，《吕氏春秋·大乐篇》云：“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高诱注：“‘两仪’，天、地也”。人莫不戴天而履地，而天地则同出于“太一”，明“太一”为宇宙之主宰，故曰“泰皇最贵”。后人不明此义，改“泰皇”为“人皇”，则所谓“最贵”者云何？后世迂儒为欲确定三皇其人，纷纷以伏羲、神农、燧人、女娲、共工、祝融等茫昧之名配之，异说益纷纭矣！

五帝之说，疑当起于东、南、西、北、中之五方帝，而五方帝之说则起源于五行。五行者，天地间之主要物质，古人分为木、火、土、金、水五类，互相生，亦互相尅，本为朴素唯物论，未尝有其神秘观念。今所见古籍，出于战国前期之《墨子》所引《甘誓》，其文曰：“威侮五行，怠弃三正”。此“五行”与“三正”，或即为“五帝”与“三皇”之哲学背景乎？至其神话之初见，则《墨子·贵义篇》云：“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其所谓青、赤、白、黑四色之龙，疑即青、赤、白、黑四色之帝，亦即木、火、金、水四府之神，墨子为人，尊天志、尊鬼神，富于宗教色彩，五行说之陷入唯心主义，似开始于彼而邹衍辈则继承之者。古人恒以“龙”代表“帝”与“神”，其所谓杀四龙之帝盖即主戊己之黄帝，亦即中央黄龙之神。《左传》昭十七年：“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易·系辞传》：“云从龙”，可为其旁证。《孙子·行军》云：“黄帝所以胜四帝”，似即指帝杀四龙之事。此四帝与黄帝合言，即为“五方帝”，亦即最早之五帝说，是知五帝洵为神而非人。在此五方帝中，惟黄帝有最上级天帝之资格，故其传说最风行，其人格化亦最早。邹衍《五运》说起，遂以最上级天帝之黄帝为人王，而实定其时代于夏、商、周之前。其后荀卿等人王之五帝说因之而起，然犹未实定其人也。及汉初《五帝德》、《帝系姓》等书出，初转载于《史记·五帝本纪》，继转载于《大戴礼记》，而后黄帝与颛顼、帝喾、尧、舜遂合而为人王之五帝。至西汉后期《月令》出，一转载于《吕氏春秋》，再转载于《小戴礼》，而后太皞、炎帝（即赤帝）、少皞、颛顼傅合青、赤、白、黑四帝而与黄帝共为“五神帝”。三皇、五帝之说，忽神忽人，变幻莫测，可谓极宗教界之伟大创造，然而其事之发生则固远在春秋之后，夫安得豫载其文于《三坟》、《五典》，以成诵于楚史倚相之口哉！

颛刚附案：《周礼·春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郑玄注：“楚灵王所谓《三坟》、《五典》”，是为实定三皇之书为《三坟》、五帝之书为《五典》之开始，彼援引《左传》之文以入《周官》，使古文家之两巨典虽有异词而可互相补足，洵为巧合。然郑氏此说，贾公彦作《周礼疏》即已疑之，故其言曰：“按《孝经纬》云：‘三皇无文……’又《世本·作》云：‘苍颉造文字’，苍颉，黄帝之史，则文字起于黄帝。今此云‘五帝之书’为可，而云‘三皇之书’者，三皇虽无文，以有文字之后仰录三皇时事，故云‘掌三皇之书’也”《疏》已疑《注》，知三皇之世尚无文字，何来历史记载；而终加回护，云“有文字之后仰录三皇时事”，则以守“《疏》不破《注》”之例，不得不曲说为追记之书以文郑《注》之非也。至《古文尚书序》所云云，则王肃辈袭郑说而加以发展者，其无信据之价值自不待言。

按《尔雅》一书中，有《释地》、《释丘》、《释山》、《释水》四篇，为分类记录地理之文字，所录虽凌乱无序，而亦可借以窥见古人对于大地情况之类别观念。其《八陵》节云：“梁莫大于溟梁，坟莫大于河坟”。郭璞《注》：“‘溟’，水名。‘梁’，堤也。‘坟’，大防”。如其说，则“溟梁”为溟水之堤，“河坟”为河水之堤。两者同物，而乃有“梁”与“坟”之异号；物莫能两大，而乃皆特举之以为“莫大”，思想混沌，即此可识。《释丘》一篇，就丘形以定丘名，为数凡三十四，以今日术语名之，皆为丘陵地之异相。然中云“三成为昆仑丘”，郭《注》即以昆仑山释之，是其所谓“丘”者与山岳何异？且《释山》中亦多言“小山”，又不知其所谓“丘”与“山”之别何在，而必析之以为二

篇?此可见《尔雅》之科学性远出《禹贡》之下。然露一奇异之现象,则楚史倚相所读之“坟”与“丘”之名皆在焉,意者《三坟》为记堤防之书,《九丘》为记高原之书乎?将一以治川泽而一以掌山林者乎?将坟少而丘多,因有此不平衡之卷帙乎?此则今日虽不能一一为作充分证明而犹可借以资存疑者也。至于《八索》,则孔颖达《疏》已云:“八卦之说,谓之‘八索’”。章炳麟亦已于《八索释名》中畅论之矣。

以上三名,皆待地下资料之发见而作结论;惟《五典》一名则今可得而实证之。《国语·楚语下》记王孙圉聘于晋,定公飧之,问楚之宝焉,对曰:“…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此事证以《楚语上》,庄王使士亶傅太子箴,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两文相较,知倚相所掌者实为《训典》,此书所载,有记“族类”如《帝系》,有记“行义”如《周礼》,故可以教太子使知治国之纲要,又可以献楚王使知历代列国之成败。以后世作帝王教材之书拟之,则司马光之《资治通鉴》及杜佑之《通典》,作用仿佛相同。又《战国策·楚策一》,莫敖子华对楚威王曰:“…吴与楚战于柏举,三战入郢,……蒙谷……遂入大宫,负《鸡次之典》以浮于江,逃于云梦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乱。蒙谷献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姚宏《校》:“‘鸡’,一本作‘离’”。按“鸡”与“离”两不可通,不审其为何字之误,而“典”则即《训典》之简称也。观蒙谷负《典》以逃而“五官失法,百姓昏乱”,及其献《典》于王而“五官得法,百姓大治”,则此《典》即《五典》可知也。五官为楚之高级政务官,故《五典》为楚之行政大典章,有类于《周礼》及《唐六典》等书之制作。是以出于战国后期之《尧典》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又《皋陶谟》曰:“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盖皆沿楚制而上托于唐、虞者,无须我辈喋喋以辨说之矣。

后 记

一九七九年八月,张舜徽教授与崔曙庭同志为了创办《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来京访问顾颉刚师,征求意见,请他题签和撰稿。顾师深为赞成,当即挥毫书签,并允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一文。在八、九两月中,他为此搜集了不少资料,可是终因年老、体弱、多病,未能写成。最近整理他的遗稿,发现在十年动乱期间他所写的一篇《三坟、五典》,正是他七九年所写文章的一部分。爰缮清付梓,藉了其遗愿。

王煦华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八日

叟翁遗札

周叔叟 遗著 周一良 整理

编者按：周叔叟先生为一代名贤，胸怀豁达，学识渊博，而尤精于鉴赏。生平收藏宋元明清旧槧书籍及古代文物，充栋积宇，晚年悉以捐献国家，丝毫不留于己，世尤叹为难能。先生文笔高雅，书法遒劲，人或得其片纸，皆什袭藏之。惜其平日不自收拾，散失已多。先生既卒，哲嗣周一良教授从四方友好处访得考论书籍短札若干版，哀为一帙。虽仅存十一于千百，未足以窥其全，然片言数语，皆碎金也。远道见寄，因亟刊出以饷世之治版本学者。札中所涉人事有必须指实者，一良教授已一一注明之。

致徐乃昌（积馀）

一

前奉 手示，并 惠赐蓝印《玉台新咏》，光彩夺人，感谢之至！拓本四份，已交舍弟^①。兹附上汉居巢刘君冢中镇石及石羊并小子碑拓本各一份，乃舍弟所藏汉石之冠。石羊出于寿洲三人集。吾皖汉石不多见，此更可宝。闻随陶夫人墓志藏吾 丈处，舍弟欲求一打本，并《玉台新咏》一部，不知能俯允否？去年临清徐氏书出，侄颇见宋本数种，索价太昂，力不能收。所得者不过零星钞校之书，无可述者。今年所得，亦只《法华经》一种差强人意耳。（贾家经籍铺所刻，尚有《文殊指南图赞》一种，亦在日本，罗氏吉石盒影印。）前年侄所刻《屈原赋注》，奉寄红印一部，乞 哂纳！南方如见好书，乞 示一二！

陶子陵刻景宋及仿宋字书，每百字价若干，乞 示知！

^① 指先四叔周进，字季木，金石收藏家。所藏石刻印有《居贞草堂汉晋石影》，所藏陶片由表兄孙浔（师白）、孙鼎（师匡）兄弟编成《季木藏陶》出版，所藏铜器由商承祚先生收入《十二家吉金图录》。

二

（1927年10月30日）

前月奉 手书，并蒙 赐佳刻精拓，拜领感谢。适因舍弟银号风潮，未能即复，至歉于中也。《阳春白雪》暹藏钞本九卷，为士礼居传录孙潜夫本，比之元刻，多十余阙，大概与

爱日精庐本相同也。瞿氏书单中无绝精之品，价亦不廉，不知能寄下一看否？（欲看之书另单附上。如不可行，亦不勉强也。）闻海源阁书到津，主人极守秘密，不轻示人。徐当挽人介绍一观，以广眼福。吾丈所藏元人写本《简齐诗外集》，能觅良工影钞一部见贻否？钞工当奉上，只求其精，不妨稍昂。邈去年曾得宋本《简齐诗注》，为黄蕙圃藏书，凡手跋七则，颇欲得外集配之，想吾丈必不吝此也^①。海内战事方兴未已，所以谋生者尚不知计之何从，今仍不能忘故纸堆中生活，其情可怜亦可笑也。

三体石经拓片容即寄呈

《抱朴子》顾校

《酒经》毛抄

《易林》陆校

《陈众仲集》抄本

① 此书后归先父自庄严堪。

致叶景葵（揆初）

一

前奉手书，敬悉一切。家叔^①师古堂及舍弟志甫^②所刻书，已分别寄上，闻已收到矣。自事变以来，邈伏处津沽，罕与世接，刻书之兴大减。亦因纸墨昂贵，力有不足耳。兹检上《十经斋遗集》、《魏先生集》、《泛鳧亭印撷》及亡弟《居贞草堂汉晋石影》并遗墨迹各一部，乞查收，当时或已寄呈也。一月以来天气酷热，未知上海何如？近三四日得透雨，稍凉爽矣。菊生年丈曾编涵芬楼善本书目，闻未刊行，不知可传钞否？便中祈为一询！近日涵芬楼书有可零星出让之说，有人拟得其戏曲全部也。

① 指先叔祖周学熙。

② 指堂叔周明泰，字志甫，戏曲史专家。

二

自沪宁车中一别，于今已十余年。每从南方友朋中得闻消息为慰。顷蒙惠赐张氏《谐声谱》一帙，拜领谢谢！此书旧曾彙得[?]，今得睹原稿，曷胜庆幸！独恨邈十年以来为俗累所困，从前所学尽忘，急读一过，不能有所发明，殊深惭恧！兹附上邈所印书数种，聊媿空函，非敢言报也。秋风渐厉，伏维珍摄千万不宣。

致徐乃昌（积馀）

一

去岁奉手书，敬悉一切。比维道履绥和，为颂无量。三体石经拓本一纸奉上，乞察收！前函所言毛抄本《酒经》，如无水湿虫伤，敢乞代购寄下。书款当由家兄面呈。琐事上渎清神，不胜惶恐之至！客岁岁暮，以重值得北宋本《文选》十九卷。通字缺笔，盖天圣明道间刻本，与日本高山寺藏《齐民要术》相似，可谓罕秘之籍，遂不得不举债收之。结习难除，可叹亦可笑也。

二

前奉手书，并承赐观音灵课，感谢感谢！叔迦^①季木^②两本亦转交矣。友人中颇有爱之者，不知能再惠赐数本否？天津李氏藏经，顷所阅仍是明藏。据云有元藏，乃询之李氏诸兄弟，皆不得要领也。近日上海不知曾出好书否？铁琴铜剑楼之书似有散佚，暹去年得校本《齐民要术》，即目中之书。吾丈如有所见，尚乞留意！暹近颇嗜名贤手抄手校之书，其趣味胜于宋元槧本，且价格较廉，力易举也。

① 指堂叔周明夔，字志和，又字叔迦，佛学家。

② 见致徐乃昌函（一）注①。

致赵万里（斐云）

一

（1939—41年间）

前上一函，想已达览。《糖霜谱》不知可成否？念念。顷见四角胡王一印，兹附上拓本，祈鉴定！图书馆中如有汪氏《集古印存》，乞一查对，此印是否汪氏原印为叩！如蒙早日示复，尤感。《师竹堂集》已归刘静远，棉纸初印，乃梁蕉林藏书，可爱之至。海源阁《新序》、暹藏《毛诗》，皆有此公印记也。

二

（1941年6月）

前奉手书，敬悉一切。灵宝刀舍弟拟收，祈为谐价也。陈篋斋印谱不知百元可得否？请再商之！前途如不肯让，再将原书寄上也。于藏《文粹》似只一卷，首尾完具与否，已记